



## 纲目体生成史论

张赞冰

(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, 北京 100875)

[中图分类号] K092 [文献标识码] A [文章编号] 1002-5332(2023) 03-0119-04

—

宋儒朱熹撰《资治通鉴纲目》五十九卷(下文简称“《纲目》”),创造性地采用大书分注的形式,“大书以提要,而分注以备言”<sup>①</sup>,由此确立了一种新的史体——纲目体。宋代以后,随着朱熹的学术和政治地位不断提升,《纲目》受到格外推崇,踵继、效仿之作辈出,纲目体亦因之风行于世,蔚为大国,对中国古代编年纪事体例的演进,对宋元明清历朝史学的发展,都产生了显著而深刻的影响。

纲目体如何生成?其形式借鉴了哪些体例或手法,其内涵根植于哪种学术脉络?欲深入了解纲目体,这无疑是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。宋嘉定十二年(1219)《纲目》初刻时,朱熹弟子曾对是书体例渊源作出阐发。陈孔硕云:

右《资治通鉴纲目》《提要》各五十九卷,盖朱文公先生祖司马公之成书,而断以《春秋》之法,提其要以为纲,则《春秋》之经也;疏其绪以为目,则《春秋》之三传也,特微有删润而已。<sup>②</sup>

李方子则云:

纲仿《春秋》,而参取群史之良;目仿《左氏》,而稽合诸儒之粹。<sup>③</sup>

二说微有不同,但都明确指出大书分注的纲目体例系模仿《春秋》经传而为。尤其李氏之言,不仅叙于《纲目》书后,而且见于所著《晦庵朱先生事实》中,后者迭经引用,流传甚广<sup>④</sup>。清修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径称“朱子创例之初,原以纲仿《春秋》,目仿《左传》”<sup>⑤</sup>,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看法在当时已成为通行认识。即便在现代学科意义下的相关研究中,也往往直接采信此说,从而对于纲目体

[收稿日期] 2023-03-08

[作者简介] 张赞冰,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,研究方向为明代历史文献学、史学史、书籍史。

① 朱熹《资治通鉴纲目》卷首,《序例》,载朱杰人等主编《朱子全书》第8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、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,第21页。

② 陈孔硕《宋温陵刻本资治通鉴纲目后语》,载《资治通鉴纲目》附录2,《朱子全书》第11册,第3500页。

③ 李方子《宋温陵刻本资治通鉴纲目后序》,载《资治通鉴纲目》附录2,《朱子全书》第11册,第3502页。

④ 李方子《晦庵朱先生事实》,载朱玉辑《朱子文集大全类编》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16册,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本,第321页。按该文亦收于明戴铣辑《朱子实纪》卷十,题作《朱子事实》。《纲目后序》“参取群史之良”句,《事实》作“兼采群史之长”,后世诸书援引此言,多与《事实》同,故知主要是《事实》一文的传播,致使这一观点广为流传。

⑤ 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47,《史部·编年类》“御定通鉴纲目三编”条,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,第431页。

的成立一笔带过,似乎无需深论<sup>①</sup>。

然而,《纲目》初刻已在朱熹身后,陈、李二人之论,未必尽合朱子本意。在今见朱熹著述和语录中,可以找到近似“纲仿《春秋》”的说法(详后文),却无以佐证“目仿三传”的观点。因此,陈、李之说更可能是面对纲目体已然成型的精妙设计,体会朱子的良苦用心,发微精蕴,比附经典,用以表彰先师遗著而已,并非朱熹发凡起例之初的真实想法。况且,即便朱熹确有追仿经传的微意,也只是纲目体得以成立的因素之一,如果将一种新史体的生成主要归因于对早期经典的模仿,实为抽离历史情境的凿空之论,无疑会把复杂的历史面貌过于简单化,不免失之肤浅<sup>②</sup>。

## 二

陈孔硕、李方子的阐发使纲目体拥有了继续经典的神圣光环,而本文的立意在于对纲目体的生成背景与过程进行历史学的考察。任何著作都不可能完全凭空出现,无不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与一批同类著述相伴而生,也无不是在一定的文献脉络中承前启后,《纲目》自不例外。

一部著作采用何种体例,首先取决于其著述宗旨。朱熹答蔡元定书中有言“《通鉴》节只名《纲目》,取举一纲、众目张之义,条例亦已定矣。”<sup>③</sup>无论“通鉴节”是否正式的书名,这一称呼都清楚地表明,朱熹撰作《纲目》的初意,是要编一部《通鉴》节本。在《纲目》自序中,朱熹再次申明这一著述宗旨,其云:

先正温国司马文正公受诏編集《资治通鉴》,既成,撮其精要之语,别为《目录》三十卷,并上之。晚病本书太详,《目录》太简,更著《举要历》八十卷以适厥中,而未成也。绍兴初,故侍读南阳胡文定公始复因公遗稿,修成《举要补遗》若干卷,则其文愈约而事愈备矣。然往者得于其家而伏读之,犹窃自病记识之弗强,不能有以领其要而及其详也。故尝过不自料,辄与同志因两公四书,别为义例,增损彙括,以就此编。<sup>④</sup>

既然朱熹的首要目的是编成《通鉴》节本,以便阅览,那么他在确定体例时,自然会有意无意地受到早出的同类著作的影响。因此,讨论纲目体的生成,需要将《纲目》置于《通鉴》节本的文献脉络之中,将这些著作连类而观。

如朱熹所言,司马光曾亲撰两种《通鉴》节本,分别是《通鉴目录》和《通鉴举要历》。前者“撮其精要之语”,用于检寻,可与原书相辅而行;后者则详略适中,自具首尾,可独立于原书而行。这两部著作分别代表了节本的两种基本模式。由于这两种模式具有很强的互补性,所以能够进一步结合,即在《举要历》之属的基础上,又借鉴与融入《目录》的手法和功能。

试举一例以略见其情形。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宋刻本《入注附音司马温公资治通鉴纲目》《入注附音司马温公资治通鉴详节目录》各一卷<sup>⑤</sup>,经学者考证,原为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《入

① 燕永成《南宋史学研究》,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,第118-119页;罗炳良《南宋史学史》,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,第182页。这两部断代性的南宋史学史专著,皆采此说。再如曹鹏程《朱熹创设纲目体的立意及背景》,是近年少有的讨论纲目体之成立的专文,也依旧认为“纲目体的编纂形式,首先是受了《春秋》经、传合体的影响”(载《国学》第1集,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,第351页)。足见此说影响之深且广。

② 管见所及,惟白寿彝主编、吴怀祺著《中国史学史》第四卷《五代辽宋金元时期:中国古代史学的继续发展》曾论及纲目体创立的历史背景,认为“全书、节本、缩本配合成系列,可以说是宋代的学风……朱熹创造纲目体的背景是这股学风的反映”(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,第154-155页)。惜未暇详论,有待进一步补充和阐发。

③ 朱熹《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》卷2,《答蔡季通》,载《朱子全书》第25册,第4698页。

④ 朱熹《资治通鉴纲目》卷首,《序例》,载《朱子全书》第8册,第21页。

⑤ 此据《中华再造善本》影印本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。

注附音司马温公资治通鉴》的卷首部分<sup>①</sup>。是书节略《通鉴》,自具首尾,与《举要历》近似,而卷首所谓《纲目》虽然没有如《通鉴目录》一般采用年经国纬的列表形式,但标举每年大事事目,提纲挈要,以备检寻,其性质和用途皆与《通鉴目录》相仿。同时,此本不仅在卷首冠以所谓《纲目》,还将其中各条事目标于对应正文的眉端,实际上是将两种模式的节本融为一体,使读者一览眉端事目而略知纲要,细读其下正文而备悉原委,从而进一步节省翻检之劳,更加方便阅读。自南宋中期以后,这种编排形式在编年体史书中十分常见。

一旦在《通鉴》节本体例演变的视野下观察《纲目》,便不难对纲目体的历史渊源形成更加清晰的认知。朱熹明确指出,《纲目》是在《通鉴》《通鉴目录》《通鉴举要历》《通鉴举要历补遗》四书的基础上“增损摭括”而成,若更加具体而言,《纲目》之“纲”正是以《通鉴目录》作为重要参考。朱子与赵师渊手书尝谓“恐须更以本书《目录》及《稽古录》《皇极经世》《编年通载》等书,参定其纲,先令大事都无遗漏,然后逐事考究首尾,以修其目。”<sup>②</sup>即为明证。既然“纲”是据《通鉴目录》参定,那么《举要历》和《举要历补遗》无疑是“目”的重要基础。因此,《纲目》同《入注附音司马温公资治通鉴》的生成过程是相似的:二者都在司马光《通鉴目录》和《举要历》所开创的文献脉络中成书,也都巧妙地将两种节本模式合而为一。固然不能说纲目体的创立直接受到《入注附音司马温公资治通鉴》之类坊刻书籍版式的启发,但这种版式证明,《通鉴》节本的两种基本模式在南宋时期的融合是合乎情理的,也是切实存在的。从具体的历史联系出发追溯纲目体的渊源,与其说“纲仿《春秋》,目仿《左传》”,毋宁说纲仿《通鉴目录》,目仿《通鉴举要历》。南宋史家陈均与朱子同时而稍晚,曾仿《纲目》撰《皇朝编年纲目备要》,其论及纲目体,既沿用李方子之说,以纲比之《春秋》,以目比之《左传》,但又指出,“自司马公《目录》《举要》之作,至是始集大成,观者亡复遗憾”<sup>③</sup>,可谓恰中肯綮地揭示了纲目体的直接渊源,惜其说一直未得到学者重视。

### 三

对《通鉴目录》和《举要历》的踵继、改造与融合,是《纲目》确立其体例的直接原因,以此为线索,进一步放宽视野,我们可以继续追寻纲目体更悠久的历史渊源,观察其背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。

《举要历》和《通鉴》本书虽详略不同,但在形式上并无本质区别,对于纲目体的生成而言,如《通鉴目录》之属的纲要的出现,无疑更为关键。《通志·艺文略》载“《唐历目录》一卷。唐崔令钦撰,据柳芳《历》钞其事目。”<sup>④</sup>可见,撮举一部编年史之精要,编为目录,以备检寻,唐人已然为之。及至宋代,各种卷帙浩繁的编年史往往自附此类目录。《通鉴》之外,如咸平重修《太祖实录》有《事目》二卷,《真实实录》有《事目》五卷,《仁宗实录》有《事目》十卷,《英宗实录》有《事目》三卷<sup>⑤</sup>。这说明,编录大事纲要有助于阅览卷帙浩繁的编年体史书,已经成为宋人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。于是,自然有读者借助他人编成的纲要,也有敏学之士自行撮录纲要。岳珂《宝真斋法书赞》著录“陈忠肃通鉴帖”,称其是北宋陈瓘“手编《通鉴节要》真迹”,系陈氏“聿提纲目,阅岁积日”而成<sup>⑥</sup>。就《宝真斋法书赞》所抄录的其中《光武》《明帝》二纪来看,这部节本由极其简略的条目构成,一如

① 此据《中华再造善本》影印本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。具体考证参见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编纂出版委员会编《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》唐宋编史部,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,第211-212页。

② 朱熹《资治通鉴纲目》附录1,《朱子手书》,载《朱子全书》第11册,第3498页。标点有所改动。

③ 陈均《皇朝编年纲目备要》卷首真德秀序,许沛藻等点校,中华书局2006年版,第2页。

④ 郑樵《通志》卷65,《艺文略三》,《中华再造善本》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影印本。

⑤ 以上并见于王应麟《玉海》卷48,《艺文》,元后至元六年刻至正十一年修本。

⑥ 岳珂《宝真斋法书赞》卷18,《陈忠肃通鉴帖》,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》,清乾隆间活字本。

《通鉴目录》,应当是陈瓘阅读《通鉴》时所编录的大事纲要。

朱熹对这种阅读方法十分推崇并反复提倡,《朱子语类》中记载他曾多次教门人用此法阅读《通鉴》。如其尝言:

每看一代正史讫,却去看《通鉴》,亦须作纲目,随其大事札记某年有某事之类,准《春秋》经文书之。<sup>①</sup>

此处所谓“纲目”,连同前揭《入注附音司马温公资治通鉴纲目》以及岳珂“聿提纲目”之指称,皆是偏义复词,其涵义基本等同于“纲要”,形式上只相当于《纲目》之“纲”。朱熹明确提出这种大事记应“准《春秋》经文书之”,证明《纲目》“纲仿《春秋》”一定程度上或非虚言。

朱熹又言:

看《通鉴》固好,然须看正史一部,却看《通鉴》。一代帝纪,更逐件大事立个纲目,其间节目疏之于下,恐可记得。<sup>②</sup>

此处所谓“节目”,颇类《纲目》之“目”。纲目立于上,节目疏于下,日积月累,加以整顿,则一部形式上“大书提要、分注备言”的《通鉴》节本便呼之欲出。因此,在某种程度上,《纲目》一书就是朱熹及其门人读《通鉴》笔记的自然延续。《纲目》之得名,纲目体之创立,都受到这种读《通鉴》法的深刻影响。

编录纲要以阅读编年史的方法,既不始于《通鉴》,在宋代的应用自然也不会仅限于《通鉴》。有理由相信,它是宋人读史治史的一种通用方法。这意味着,纲目体的出现并非偶然,而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土壤;也意味着,纲目体并非独行特立的创造,而是有其共生的近缘体例。赵希弁《读书附志》著录黄日新《通鉴韵语》九卷,称其“大略如李瀚《蒙求》四言体,而列其事于左方”<sup>③</sup>。据此,则是书体例为先用四言韵语概括事纲,然后详叙始末,与纲目体十分相似。又如吕祖谦《大事记》一书,正文纪事仅提纲挈领,另有《解题》十二卷,对应正文纲领,略具始末而附以己见,其用意与构造,亦与纲目体近似。再如徐梦莘《三朝北盟会编》,纪事每首举纲要,然后备其始末,亦或征引文献、发表议论,俨然有纲有目,以致金毓黻认为此书“亦用《纲目》体”<sup>④</sup>。这几部著作与《纲目》大约同时编撰,内容又相去悬远,彼此体例上的相似,很难说缘于相互模仿,而更应该理解为相同的读史治史方法“同声相应”所致。

但是,不能因此而完全抹杀朱熹的“天才独创”之功。朱熹固然借鉴了当时比较通行的一种形式,却也做出了重大的改进。《纲目》的“纲”与“目”之间总体上紧密关联,严格对应,浑然一体,远非他书可比。这是《纲目》体例的创造之功,也正是纲目体的精义所在。朱子采用事纲与节目的形式,不只是为了便利阅览,而是明确赋予其“举一纲、众目张”的涵义,寄寓着“大纲概举,而鉴戒昭矣;众目毕张,而几微著矣”<sup>⑤</sup>的历史哲学。纲目之为“体”,非经此整齐、升华,便不可能实现。

(本文草成后,蒙苗润博兄指教,多获启益,谨致谢忱)

(责任编辑 汪高鑫)

① 黎靖德辑《朱子语类》卷117,载《朱子全书》第18册,第3684页。

② 黎靖德辑《朱子语类》卷11,载《朱子全书》第14册,第354页。

③ 赵希弁《读书附志》卷上,载孙猛校证《郡斋读书志校证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,第1103页。

④ 金毓黻《中国史学史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,第220页。

⑤ 朱熹《资治通鉴纲目》卷首,《序例》,载《朱子全书》第8册,第22页。